



摘要：自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明显，生育率低迷的矛盾凸显，国家立即调整人口战略布局，于 2021 年公布三孩生育政策。本课题研究组成员以数量大、可塑性强、生育质量高的新时代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论证了在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研究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归纳、总结、评述了生育意愿的内涵、结构以及影响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因素，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生育意愿；三孩生育政策；大学生

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大学生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朱占占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关举措，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我国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出修改，其中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随着两孩政策激发的生育潜能逐渐减弱，尤其是 35~45 岁育龄妇女已经逐渐错过最佳生育时期，而处于最佳生育时期的女性的生育率不佳，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生育率将会持续低迷。因此，激发数量大、可塑性强、生育质量高的新时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对落实相关生育政策，提升人口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改善人口结构，实现国家的人口战略尤为紧迫。

一、研究大学生生育意愿的意义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演变的趋势，有关政府部门不断改革调整计生政策，具体如下：2013 年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21 年公布三孩生育政策。8 年之内，三项计划生育政策的密

集颁布旨在明确鼓励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提升生育率。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8.1%，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833 万人。针对新时代大学生这一庞大生育后备军群体的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缺乏。根据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埃里克的人格发展阶段论，大学阶段是人格发展的“成年早期”，主要的心理冲突在于“亲密—孤独”，这一时期也是培育“爱的美德”的敏感期。生育意愿是个体对自身生育行为或目标的主观愿望，是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从心理学的视角，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辩证考察，有利于破解当下低迷生育率的现状，抓住生育意愿的本质，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人口结构具有指导意义。

二、生育意愿的内涵

国外学者多从发展的视角对生育意愿的内涵进行论证，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表 1（见下页）所示。

国内研究对生育意愿的理解比较一致，学界普遍认同生育意愿是个体对自身生育行为或目标的主观愿望，是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是 1992 年学者顾宝昌^[1]的研究阐释，其认为生

表1 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生育意愿内涵理论

理论名称	研究学者	主要学术观点
不确定性递进分析模型	Morgan	该模型将生育意愿进行分类,按照胎次别层层递进的方法,对生育周期中生育意愿变动进行模型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	Ajzen	该理论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计划行为理论,试图分析生育意愿形成的动机
社会认知模型	Bachrach、Morgan	该模型将态度、主观规范以及对控制的看法视为决定生育意愿及生育孩子的先决条件
生命周期控制理论	Heckhausen	该理论建立生命周期控制理论解释生育意愿的变动,认为如果实现家庭规模的“适当”条件不太可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通过资源控制和心理控制两种手段调整这些意愿。如果个人预期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目标,那么在达到年龄的最后期限之前,也可能会进行意愿调整。如果个人无法实现生育目标,并且最后的年龄期限已经过去,那么就会脱离意愿

育意愿主要包括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其操作化定义分别为初次生育时的理想子女数、理想的性别结构和理想的生育时间。

由上可知,生育意愿还没有统一的公认定义,国内外学者界定的视角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国外界定更加科学,但从发展变化的视角对生育意愿的维度进行界定,也存在维度陈旧,不适应新时代生育意愿多元化现状的缺陷。

三、生育意愿的构成

生育意愿量表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模型基础上,在反映生育意愿结构上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科学性。对生育意愿结构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早,研究深入,而国内学者大多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参考和推广,缺少具有影响力的适用性研究。其他关于生育意愿结构的研究大多是以已有生育意愿量表为研究工具,或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生育意愿的结构进行实证研究,但研究的结论大多没被验证。主要研究如下。

1986年,辜胜阻^[2]等学者的研究从为什么生、生什么、生多少、成为什么人四个角度来探讨个体的生育意愿。辜胜阻等学者将生育意愿分为生育的目的和意义、生育子女的性别组合、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对子女质量的期望四个维度。

1991年,学者Little. D研发了影响深远的《生育价值观量表》(Value of Children, VOC),量表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量表法计分:“1”表示“一点也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1。该量表由两个分量表构成,分别为要孩子的积极方面(VOC+)和要孩子的消极方面(VOC-)。其中,VOC+量表涉及三个维度(情感、家庭、传统价值);VOC-量表涉及四个维度(生活和关系损失、个人能力限制、传统阻碍、担忧孩子未来)。

2004年,有学者研究认为生育意愿包括指向的生

育目标和实现它的时间框架,生育意愿是一个多阶段和多层面的过程,可分为确定性生育意愿和不确定性生育意愿,也可根据意愿的强弱程度分为六个类别。

2005年,学者张进辅等^[3]编制了《生育价值观问卷》,该量表认为生育价值观是包括生育目标、生育手段以及生育倾向三个二阶因素和性别偏好、生育数量、生育质量、生育时间、生育方法、生育需求、生育价值、生育愿望、生育职责九个一阶因素的一个多层次和多维度的体系,具体的维度结构如图1所示。该研究构建的生育价值观理论结构比较合理,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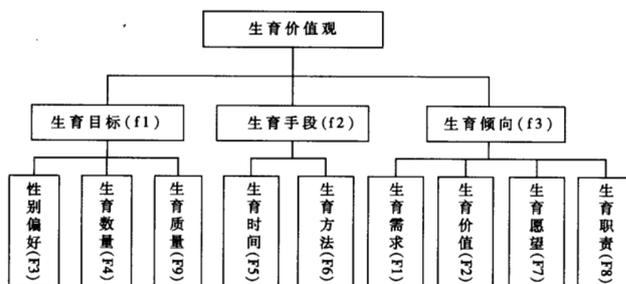


图1 生育价值观结构

生育意愿量表的测量对象大多围绕女性而进行,这些研究大多是对1991版量表的借鉴和修订,标准化的生育意愿量表还没有开发出来。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有必要在生育意愿的量表施测对象上进行拓展。同时,有关量表的维度的学说层出不穷,没有形成广泛的认可。这也提示相关学者,有必要根据生育意愿多元化现状重新编制标准化生育意愿量表。

四、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 主观方面

(1) 性别因素。以往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意愿都会逐渐降低。男性与女性家庭地位的差异、家务劳动分工



的不均、照料子女的劳动强度不均衡等因素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降低有较大的影响。同时,跨文化研究表明,性别的不平等对于东西方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时,家庭生育现状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在东方男权文化背景下,如果一个家庭中第一胎是女孩或头两胎均是女孩,来自大家庭的女性会更倾向于再生一个孩子。

(2) 受教育程度因素。国内外诸多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但均证实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较为深刻。如魏瑾瑞等学者的研究证实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反而越低。

(二) 客观方面

(1) 经济因素。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经济因素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如王志章等^[4]学者调查发现经济水平落后的人群与生育意愿不确定性没有显著相关。同时,生育以及养育的经济成本过高、经济下行、失业是导致夫妻延缓或放弃生育的重要因素。低的收入水平、收入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是影响居民延缓生育或拒绝生育甚至终止妊娠的重要因素。

(2) 文化观念因素。何兴邦等^[5]学者对文化观念如传统的“养儿防老”、生育文化等方面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养儿防老”的观念在许多国家与地区都比较盛行,特别是在亚洲文化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影响明显。

(3) 战争、灾难等突发因素。相关研究表明,重大的危机之后,人类的应激性生育意愿有提升的趋势。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和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都有回升的趋势,这是普遍现象。过往研究表明许多西方学者曾对战争、危机、饥荒等灾害对人类生育意愿的影响做过论述,并且研究成果颇丰。

(4) 国家的宏观政策。社会整体生育水平受到国家宏观人口政策的影响很大,其中的中介调节因素就是人民普遍的生育意愿。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无人口政策的限制,当地人的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

(三) 其他因素

近期有学者从医学视角关注身体状况、生育能力、生殖健康等因素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同时也有学者从工作的视角探讨就业失业、工作自主性、工作压力、工作时间等因素与生育意愿的关系;部分学者从家庭的视角探讨家庭制度、家庭关系、家庭权力分配、住房、夫妻关系等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五、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 研究深度的创新

课题组成员梳理过往研究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研究个体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经济状况等表层的因素成果较多,而对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依恋模式等内在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较少。因此,应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挖掘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如全面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提升。

(二) 研究对象的创新

过往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育龄女性,女性研究的成果较丰富,较少涉及男性,针对大学生的具有前瞻意义的研究也不多。这样对处于人格发展的“成年早期”的大学生而言,在建立“亲密—孤独”、培育“爱的美德”的敏感期的必要生育教育也缺乏必要的学术理论支持和建议。

(三) 研究工具的创新

生育意愿量表的测量对象大多围绕女性而进行,这些研究大多是对1991版量表的借鉴和修订,标准化的生育意愿量表还没有开发出来。从研究的现状看,有必要在研究对象上进行拓展。同时,有必要根据生育意愿多元化现状及生育行为的细微变化,重新编制标准化生育意愿量表。[作者单位系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部。基金项目:2021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大学生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及整合模型研究”(21C1010)]

参考文献

- [1] 顾宝昌.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J].人口研究,1992(6):1-7.
- [2] 辜胜阻.生育动机探讨[J].应用心理学,1986(4):8-11.
- [3] 张进辅,童琦,毕重增.生育价值观的理论构建及问卷的初步编制[J].心理学报,2005(5):665-673.
- [4] 王志章,刘天元.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J].人口学刊,2017,39(4):17-29.
- [5] 何兴邦,王学义,周葵.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的经验证据[J].西北人口,2017,38(2):31-38,53.